

制度适宜 与 经济发展



ZHIDU SHIYI YU JINGJI FAZHAN

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

李若谷 著



人民出版社

制度适宜 与 经济发展



ZHIDU SHIYI YU JINGJI FAZHAN

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

李若谷 著

策划编辑:李春生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李若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 - 7 - 01 - 007230 - 2

I. 制… II. 李… III. 经济制度-研究 IV. 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2829 号

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

ZHIDU SHIYI YU JINGJI FAZHAN

李若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72 千字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7230 - 2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过去十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就是希望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并抽象上升为一种理论，使它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民族有绵延不断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据说是人类社会唯一一个没有被打断过的文明。当我参观河南安阳的殷墟、洛阳的天子驾六、西安的兵马俑、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时；当我读到河北满城的金缕玉衣、西安法门寺地宫的佛舍利、湖南里耶的秦朝竹简以及湖北荆州历经千年不腐的古尸等重大考古发现时，我就有一种冲动，一种让我热泪盈眶的冲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何等的灿烂、辉煌！中华文明对人类古代社会的影响也许至今也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也许高山与大海的阻隔使本应具备的震撼力没有传播出去，也许是数百年、上千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把那些记录湮灭。但这一次我们不应让中华文明的传播再次受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宝贵经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经验认真地总结出来，那就是我们对不起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对不起中华民族的祖先，也会是我终生的遗憾！

在这种冲动的支配下，我不断思考着从哪里入手总结，怎样归纳为一个简单易懂的理论。当真正坐下来着手这项工作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知识、水平太欠缺了，浩瀚的文海，无数的案例，有时真让人感到自己太渺小，无力去完成这项工作。然而改革开放 30 年的纪念日越来越近，它的脚步声常常使我从梦中惊醒。也就是这样的惊醒使我产生了许多“神来之想”，也使我终下决心从制度入手来认识、分析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在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总算完成了《制度适宜与

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这本书。尽管我自己不断地思考，反复与同志们探讨，而且四易其稿，但当这本书的初稿完成时，我心里的感觉仍然是遗憾！遗憾这本书写得太仓促，遗憾书中的理论、论述、分析不全面、不严谨、不完善，遗憾还有许多问题想说而没有说到，遗憾没能更早地完成，遗憾……太多的遗憾。有一位朋友说，别那么追求完美，也别想把所有想说的都说到，给我们其他人留些事情做。也许是这样一句安慰的劝解之言，使我茅塞顿开。是呀，我一个人的力量、头脑是绝对不够用的。无论我怎么努力，摆在面前的这本书都不会完美无缺。

我的理论造诣不算深厚，实践的经验也不算丰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分析上，甚或在文字上本书都可能存在不足。因此，我没有丝毫要炫耀此书的想法，只是希望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学者，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能更多地思考我们30年的经验，把它总结出来，发扬光大。如果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吾愿足矣。唯此，那就让批评、评论本书不足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本书共八章，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行考察。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但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和解释都只能从某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谜给出部分答案，缺少一个能够贯穿始末、全面揭示中国奇迹的核心。正是对这一核心的探索，引出了制度适宜的理论。为了验证该理论的解释力，我又分别考察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凡是成功的发展之路都是适宜的制度使然。这更加坚定了我将制度适宜作为本书核心的决心。本书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比较，说明制度适宜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并且指出，在发展的道路上没有永恒的制度，只有不变的发展主题。也就是说，只要能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制度，就是适宜的制度。

本书的一些术语在使用上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我在使用“经济发

序 言

“展”这一词语时，更多地是指“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核心”，没有了经济增长，发展是句空话。但经济增长并非一切。特别是如果经济增长最终没有带动社会的进步，那这种增长也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说明这双重的含义，我选择了“经济发展”这一更全面、更完善的表述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将制度定义为保证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行为规则，没有严格界定制度与政策、措施的区别。这主要是考虑到，本书并非论述制度经济学或讲制度本身的理论专著，着重关注的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有些政策、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类似制度的作用。例如，对一些地方的优惠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但对经济发展发挥了与制度相类似的功效。因此，我们没有刻意对制度、政策与措施进行学术意义上的严格区分，而着重着眼于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同样，在使用“制度适宜”和“适宜制度”这两个表述时，我更倾向于把制度适宜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出来使用，即它代表的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理论。而“适宜制度”是指具体的适应发展需要的一个个制度。

本书初稿完成后邀请郑新立、戴伦彰、张蕴岭、张燕生、余永定、李扬、夏斌、何帆、汤敏、左小蕾、韩宝江、唐旭、杨瑞龙、刘光溪、李晓西、钟传水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评论，其中许多已被采纳，在此向上述专家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杨纪东、冯春平、成泽宇、刘强、王晔、李晓炜、李晚晴、陈叶青、林罡等同志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本书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我对他们的感谢无法用语言表达。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为了使本书尽快出版做了巨大的努力，亦深表感谢。

李若谷

2008年6月20日

前　　言

30年的时间，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是短暂的一瞬。但过去的3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却在短暂中孕育着长久。这30年的历程对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乃至对世界发展与进步的影响，必将是长久的、深远的。

在一个人口占世界1/5、国土面积广阔、多民族，人均财富、资源、收入水平都十分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之融入已经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中去，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需要怎样的勇气与决心？需要怎样的信心？我们用何种语言来形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勇气、决心和信心都是不为过的。只有在中国这片国土上才能产生拥有如此胆略与智慧的领导人和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一场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运动，一场让中华民族再次辉煌的运动。

要考察中国30年的发展，我们必须将记忆翻回历史的起点。1978年中国刚刚经历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上的。十年浩劫中，人们的思想极其混乱，生活十分贫困，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不少人直到今天也不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我想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举一组数字说明这个问题。“文革”期间，中国经济严重倒退，各项经济指标都大大低于“文革”前，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工业总产值指数、国民收入指数分别从1953～1966年的7.1%、15.3%和6.2%降至1967～1976年的5.5%、9.8%

和 4.9%^①，国民收入损失估计达 5000 亿元之巨^②。1978 年时，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凭票证限量供应，有多达 3 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温饱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世界最低水平。按世界银行以 1995 年不变汇率折算的数据，我国 1978 年人均 GDP 只有 151 美元，在有数据记载的 128 个国家中排名最后。^③ 我想凡是承认现实，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做出相同的判断：我们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

中外发展结果的对比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是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④。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我们自己的实践会告诉我们哪一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应该选择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太崎岖、太艰辛、太困难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屈辱让我们明白了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与西方进行了多次战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就是没有失败的中法战争，也以割地赔款了事。在 50 年的时间里，中国共赔付西方国家 13 亿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 1500 多亿美元^⑤。更不要说被西方掠夺走的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文物古董。这些财富成为西方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中国自己的发展却举步维艰。我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结果是不过百日的变革导致改良派志士仁人血染京城，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建立一个统一和稳定的共和国。使得这位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在抱憾离去时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呼吁。代表各种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阀混战，所谓的代议制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北伐虽然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第 536、543、549 页数据计算；国民收入指数数据来自李成瑞，《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经济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②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5 页。

^③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页。

^⑤ 按 19 世纪末 1 两黄金约 37.3 克、合 10 两白银并以当前 900 美元/盎司的价格估算。

打败了北洋政府，但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渴望发展，期待富强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这样，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走自主发展道路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及其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身上。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真正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始，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动战争的德意日经济几乎被战争摧毁，而盟方的参战国也沦为一片战争的废墟，除了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的恢复与发展提供支持和援助。由于颇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选择了与新中国为敌。中国只能采取所谓“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以实现国际进步势力的团结，自然而然地，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开始模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供学习借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建立在许多特殊环境和条件基础上的。例如苏联一成立就遭遇西方反动势力的围剿、封锁，始终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而且内外反动派不断破坏苏联的发展；苏联又是多民族、多种宗教信仰、地域十分广阔的国家，权力不集中容易导致分裂；再加上后来极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内外环境使得苏联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机械化理解，也把计划与市场作用完全对立起来。在苏联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加以传播推广，它的失败是不言自明的。中国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虽然按照自己的国情做了一些调整，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基本保留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经济比较落后、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是有其必然性和适宜性的。因此它也造就了新中国初期的巨大成就。我们不仅在朝鲜战场上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打到了谈判桌上，而且在一边战争、一边生产的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在苏联的支援下，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打下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460%,钢年产量从 15.8 万吨增加到 535 万吨,原煤年产量从 3243 万吨增加到 1.3 亿吨,发电量从 43.2 亿度增加到 193.4 亿度,农业总产值增长 85%,粮食年产量从 1.13 亿吨增加到 1.95 亿吨。^① 工业制造业也几乎从零开始发展到具备制造汽车、飞机、火车等产品的能力。这些成就的取得极大地鼓舞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决心,也使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原本应该持续很长时间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会大大缩短,使我们认为这种一定条件下获得成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模式。同时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冷战的加剧,使得我们把阶级斗争看得更加重要,把阶级斗争的内容加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中。这不仅使得经济发展带有了更强的政治倾向,而且使国家、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政治斗争上,使我们无法认真思考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因为任何偏离这一方向的经济发展都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这样就埋下了后来经济发展不顺利的种子。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高度集中计划的发展模式,而是没有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的国家都在追求发展和繁荣,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从历史上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要受到既有社会制度的制约,甚至是打击和扼杀,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受到封建制度的抵制,都是经过反复的较量才杀出一条血路,而且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是对内严酷剥削和对外侵略与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所以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出现在欧洲的海上强国中就不奇怪了。先是荷兰,再是西班牙、葡萄牙,最后是英国,欧洲大陆的法德意等国反而因为内部战争等原因没有更早地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是到了 18 世纪以后才逐渐赶上来。支撑早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另

^①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5、545、548、553 页。

一个重要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纺织机、蒸汽机、电、火车、汽车的发明大大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早期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比较特殊，他们靠对殖民地的统治，获得了资金和劳动力，更容易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而这些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国家发展时已不复存在。战后新独立和新成立的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只能用不同的办法解决，于是新兴国家进行了各种尝试。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非国家来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第一要务。国家独立之后，他们也急于要摈弃以往的殖民地经济，希望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代表着人类实行社会主义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并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代表着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当时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又被简单地归纳为高度集中、国家控制一切的模式。而实际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经济都十分落后，人才匮乏，制度缺失，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殖民地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单一化。这种情况下没有大量的外援，发展中国家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当然也就无法发展经济。遗憾的是，当时能够提供外部援助的国家与机构十分有限，大多数新兴国家的发展遇到了资金的瓶颈制约，发展很不顺利。发展中国家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成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放弃社会主义，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的“民主”道路，并按照“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近 20 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他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例如正式的民主制度并非一定会对腐败行为给予恰当的制止，也不是所有集权国家都缺乏抑制腐败的机制。负责任的机制和制度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并非简简单单的是正式政治

制度的功能”。^①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发展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大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比较早地推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未走上发展之路，还在选择适合其情况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情况比较复杂，西亚、中亚、南亚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东亚的经济发展比较好。

东亚经济的发展道路以出口导向为代表，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东亚各经济体本身的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具有牺牲精神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东亚经济的成功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东亚模式”。这一模式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政府主导，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重视教育等。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这一点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情况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东亚经

^① World Bank,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2005, p. 14.

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这其中的经验教训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总结。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地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在理论上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共识。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因为它是思想解放的号角。由于这一共识的形成,我们挣脱了束缚我们思想和发展的禁锢,冲破了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这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不进反退,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全部凭票供应,产品的质量远不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再这样发展下去,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的几个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当时安徽省的领导和中央的领导有魄力,支持并推广了这一做法。这一改革使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农业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连创新高。1979~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5%,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31万吨。^① 经过多年的实践,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和农业的发展。

^①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45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 换句话说，只要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我们正是按这一理论去实践，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主要指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核心。这个时期要维持多长时间，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差异比较大，不好定下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从中国的情况看，从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到重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分水岭出现在人均GDP 800～1000 美元之时，也就是在2000年左右，大约是改革开放后的22年。

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认识到了增长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经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总结报告认为“改革不仅要产生效率，更要促进增长”。^② 如果经济不能获得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不能提升，那么再好的政策、措施、制度又有什么用呢？它们的“好”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实行的制度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实力的提高吗？

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是从农村、农业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80%，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在许多国家解决本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是什么难题，但在中国要让13亿人都吃饱、穿暖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新中国的政府彻底解决了这一困扰中国发展的问题。我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对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World Bank,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2005, p. 10.

国国情的真实写照。如果看一下过去的历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石油价格往往是通货膨胀的晴雨表。石油价格上升，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在中国，过去30年中，几乎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与粮价的上升相联系的。粮食价格对于中国就像石油价格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所以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这是中国改革从农村、农业开始的根本原因。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从农业过渡到工业时，我们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在允许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先放开商业企业、服务型企业，如理发店、餐馆、自行车修理等，然后再放开中小工业企业。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予以解决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也是不断变化的。开始提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后来又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应该说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不断认识这场改革开放的思维路径，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如前所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的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做法十分特殊。我们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

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因此,1979年我们恢复了农业银行,1984年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分设出去,又把财政部的基本建设司分出来成立建设银行,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仍然是次要问题而且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经济是个关键课题,应该予以认真地研究。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如果利用不好,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一点也不为过。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就一直提倡与时俱进,提倡创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笔者理解这个创新除了包含在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之外,还包含着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上也要创新。墨守成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无论是西方的理论还是中国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都要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提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造就了不少大企业家。但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①,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当初发展乡镇企业是对的,后来关闭污染的“五小”企业也是对的。正如中国人常说的,此一时,彼一时。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引起的污染问题。

^① “五小”企业是指小炼铁、小炼焦、小化肥、小造纸、小煤窑。

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不拘泥于固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一种争议，即中国是否特殊？有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没什么不一样，应该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有人认为中国是特殊的，因此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问题，西方的实践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中国既特殊又不特殊，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我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因此中国是特殊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①，大概是150万失业人口，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这么多的人失业，需要大量资金、住房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庭，那将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用西方既有的理论与实践无法应对，这是我们要不断创新的基本原因。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实践。我们承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无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的情况下应该少干预市场的运作，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还要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其他国家也有。2008年春天中国的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会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

^① 为了简单起见，这里用总人口而不是劳动力人口作基数。